

南大智库文丛
李刚主编



2017 Chinese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本报告由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
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 联合发布

CTTI智库报告(2017)

李刚 王斯敏 陈媛媛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动
智库建设健康发展研究”（17JZD009）和江苏
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江苏新型智库建设与评
价研究”（16ZD007）中期成果

南大智库文丛
李刚主编

CTTI智库报告(2017)

李刚 王斯敏 陈媛媛 主编

2017 Chinese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CTTI 智库报告. 2017 : 汉、英 / 李刚, 王斯敏, 陈媛媛主编.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5

(南大智库文丛 / 李刚主编)

ISBN 978-7-305-20088-5

I. ①C… II. ①李… ②王… ③陈… III. ①咨询机构—研究报告—中国—2017—汉、英 IV. ①C93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860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大智库文丛

丛书主编 李 刚

书 名 CTTI 智库报告(2017)

主 编 李 刚 王斯敏 陈媛媛

责任编辑 付 裕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21.5 字数 315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0088-5

定 价 5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CTTI 智库报告(2017)》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朱庆葆(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李春林(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

陆先高(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

范从来(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教授)

副主任

李向军(光明日报理论部原主任)

薄洁萍(光明日报理论部副主任)

尚庆飞(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任,教授)

王月清(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教授)

委 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金鑫荣(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教授)

李 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教授)

孙建军(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

王斯敏(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副主任,智库版主编)

王文军(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

薛志红(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大学与智库

——“南大智库文丛”总序

中世纪的大学是学者的行会，传道授业是最基本的使命，也是教授们谋生的手段。柏林大学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先河，成为现代大学的原型，但是由于曲高和寡，它被人们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二战以来，美国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着眼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把服务社会列为大学的第三个基本功能。智库作为现代社会从事战略和政策研究、咨询的专业机构，是现代政治运作、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综合需求的产物，是知识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的产物。大学不等同于智库，这是一个常识。一般而言，大学的历史要比智库悠久得多，大学的体量要比智库大得多，大学的结构和功能要比智库复杂得多。大学和智库的关系本来并不复杂，但是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有学者惊呼“高校就是高校，不能把高校建成智库”，一时间大学和智库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很有必要对大学和智库的关系做系统的讨论。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和智库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机构。虽然大学不是智库，但是大学和智库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时密切到难以分割。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单元，学科建设是大学的重中之重。对于智库而言，政策问题的咨询和研究是基本运行单元。当然学科取向和智库的问题导向研究本不应该对立。学科具有二重性，根据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学科一方面是知识分类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社会知识再生产的规训制度体系。例如理工农医等学科分类，一方面这是现代社会知识的

分类体系,另一方面现代大学也是按照这个体系进行人才培养、研究基金分配和各种学术资源的组织。但是这种按照知识主题领域的内部结构聚类的分类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进入信息社会后,大量前沿的知识领域已经无法纳入传统的以主题为分类依据的“学科”,所以出现了“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概念。大部分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学科”都是问题导向的。智库研究和咨询有专业领域的分别,比如外交智库、科技智库、社会智库等,智库的专业领域和学科分类有一定关系,但是,智库的研究和咨询是无法局限在一个固定学科范围内的,智库研究和咨询是问题导向的,解决问题需要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视角、方法和技术。但是,我们又不能割裂智库和学科之间的联系,因为好的智库研究咨询一定有自己的学科背景,智库研究的大量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往往来自特定的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都为智库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概念和分析范式。比如,“软实力”“SWOT”“文明冲突论”“现实主义战略论”等智库经常用的概念都来自特定的学科。

有人认为,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高校智库就对现实的国计民生问题指手画脚,这种行为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一种知识的不诚实。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当下的许多智库而言,这是非常及时的提醒。中国古代“士”阶层有强烈的济世情怀,有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看成是最风流潇洒的事业。这种古代智囊的遗风很容易被当代智库继承,所以当代中国智库需要警惕的是浸染古代智囊不调查不研究,信口开河的不良风气。现代智库强调循证分析是现代科学精神的体现,是某一领域长期知识积累后的发现,提出的政策建议出于“知识的诚实”。

学科发展促进智库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出现在美国。1957年苏联率先成功发射卫星,这对美国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让美国全面反思自己的教育体系。1958年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该法案要求大力推动科学、工程和外国地区研究,并为这些学科提供巨额经费支撑。此后美国的地区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对中国的研究也

得益于国防教育法,在费正清的倡导下,美国的“中国学”学科渐成气候,西方传统汉学没落,着力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国学学科成为主流。在中国学学科范式的熏陶下,一代又一代学人不仅占据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国研究院系的教席,而且“中国学”也成为智库中“中国问题政策分析”的主流范式。2007年,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几乎所有华盛顿区域的智库都有一人或者多人全职或者半职专门研究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他列举了30位工作于智库的中国学研究专家,这些专家在他看来都是可以和大学教授平起平坐的专家。他说:“正是这些在学术机构和智库的研究人员共同催生并推动了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这一领域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智库史专家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掮客》里把智库专家分为六类,第二类专家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政策领域进行长期研究的人。他认为,“这些人可以称作‘政策专家’,属于这个领域的学者通常将更多的时间致力于政策研究或者教学上而不是政策制定和全职顾问。无论是通过融入政策的理论洞见,还是培养继续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学生,他们的工作或许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人一般工作于大学的研究中心。”我们认为,这类政策专家从事的是“学科”层面的工作,他们的使命是为智库的实务生产概念、准备理论、锻造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及其分析范式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概念为智库分析国家综合国力提供了崭新的超越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波特提出的竞争战略分析框架被许多战略研究智库用来分析国家竞争力。这都是学科突破促进政策分析的经典案例。这也解释了为何一流智库专家大多出身于一流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因此,越是一流的政策学科,越是一流的政策专家,越是能够促进智库的分析和咨询能力。

大学也是智库人才的摇篮。智库的人才从哪里来?全部靠自己培养吗?世界上的智库除了兰德公司有自己专门培养政策分析师的研究生院外,恐怕没有其他智库

自己培养智库人才。当然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中国智库也培养研究生,但是他们的研究生大部分都不是针对公共政策研究需要的,和兰德还是有区别。那么,智库的人才显然主要来自大学,据调查,美国著名大学社会科学类的研究生中45%首选到咨询公司和智库工作,特别是政治学(美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属于政治学,这和中国不一样)研究生把到华盛顿著名智库实习和工作当作未来从政的终南捷径。

中外许多著名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都很强,到智库中从事政策分析工作显然是大学社会科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的一个重要出路。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一直是所谓的“学科建设取向”,对大学而言,衡量一流学科的指标是核心期刊论文、专著、项目、博士点的数量。至于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不能为智库所用,是不是智库所需要,这并不是它们所关心的事情。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国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大纲,不难发现,没有多少课程是专门为智库等政策分析部门服务的。令人忧思的是当代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过分强调一级学科建设,造成对“学科”的理解过于狭隘。因为过于强调一级学科建设,许多交叉研究和问题导向的研究在中国的一级学科中就无足轻重了。比如,“区域研究”是西方大学普遍设立的学科,是培养博士和硕士的重要平台。而在我国像“非洲研究”“印度洋研究”等区域研究在我们的学科分类中很难在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中出现,属于所谓的三级或者四级学科,因此许多高校认为区域研究学科层级太低,对一流学科建设贡献度不大,不会给予独立的学科建制。对于全球化治理任务日益繁重的我国而言,这就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后果,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研究的沿线区域国别研究力量非常薄弱,相关人才匮乏,知识供给滞后。同样的,区域研究的智库人才也无法及时补充,雇佣的研究人员都是 from 其他学科“改行”而来。大学学科建设如何满足智库人才是值得大学关注的问题。

二

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目标。2014年10月27日,《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交“深改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习近平总书记就智库建设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2015年1月20日,中央两办正式印发《意见》,揭开了新型智库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大学不会也不可能置身于这场新型智库建设的浪潮之外。的确,大学不是智库,但是大学可以培育智库,而且能够培育出很好的智库。发挥智库作用是哲学社会科学几大功能定位之一,而新型智库则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机构。大学既不能混淆学科与智库的区别,也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必须形成学科建设和新型智库建设螺旋发展、良性互动的新格局。学科是大学教学、研究和知识分类的基本建制,迄今为止仍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西方大学里培育优秀智库的案例并不少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本身就是培养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著名机构,该学院下属的贝尔夫中心等机构都是美国顶级的智库。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也是顶级的智库。近几年我国大学里也培育出了若干个著名智库,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研究院、复旦大学的发展研究院、中山大学的粤港澳研究院等。

但是大学办智库也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大学对培育学术型研究中心的经验和模式有路径依赖,因此很容易用建设学术型研究中心的思路来培育智库。大学学术型研究中心与智库最大的区别是学术机构关心的是教学和研究,研究成果的主要去向是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和学术出版社;而智库关心的是通过研究、咨询和传播活动

影响政策共同体或者影响公众舆论,对于智库而言,大部分研究项目从启动之日就明确了目标受众。当然自由研究在智库中不是没有。据华盛顿发展绩效研究所前董事长大卫介绍,他们研究所鼓励员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做不带任务的自由探究。布鲁金斯学会也给予资深研究员自主选择课题的自由。但是智库的自由研究不可能离开智库的大盘子,“如丸走盘”,自由选择是受智库的专业领域限制的。

大学培育智库时,往往受到学术机构建设的惯性思维影响。因此,虽然当下我国许多大学的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在向智库转型,但是转型成功者不多。主要原因是观念认识不到位;对智库本质认识不到位,对智库运行模式认识不到位,对智库产品设计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对智库传播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大学研究中心产出相对单一,而智库的产品(products)则包含研究报告(表现为各种出版物)、咨询服务、活动(智库主办的各种会议、论坛、听证、调研等,本质上是智库利用自己的专家、场地和品牌提供的服务)。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了292场活动,2万多人参加;举办了110场在线讨论,有5.9万人参加。恐怕我们任何一家大学的研究中心都不可能办这么多活动。如果智库局限于研究工作,以研究报告为主要产品,那么,这种智库和大学研究中心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大部分智库都是此类性质,因此很难称其为“智库”,这是典型的“智有余而库不足”。

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基地向智库转型的困难之二是缺乏熟悉智库业务的营运人才,尤其缺乏“政策企业家”。大学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长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长于思考与写作,但是运营能力严重不足。办事、办文、办会都非其所长。一旦让教授们运营智库,如何处理好与政府、媒体、客户之间的关系,如何从事智库内部的管理,这些对他们而言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教授运营智库会存在很长的不适应时期。

例如,电视普及后,智库专家主要承担“政策解读”角色。而现代媒体已经从狭隘的新闻报道转向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分析,为适应这种趋势,媒体不仅需要

更专业、拥有更好教育背景记者，同时也更倚重专家的力量。现在公共政策专家、公共知识分子与记者和编辑已经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他们在报纸专栏、广播新闻项目以及从电视衍生出来的访谈节目中找到了机会。报纸和电视新闻记者依靠这些专家来使每天的新闻报道更具深度，体现多样性并实现观点上的平衡。实际上，寻求争论本身就已经扩大了讨论的范围，将这些专家带到了聚光灯之下，他们作为权威人士对各种社会热点作出评论。这种角色对于习惯于象牙塔的大学教师们而言并非易事。

成功的智库领袖往往都是“政策企业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机构建设。他们调用资源来推进一个特定议程的实现，或者是促成不同研究者和行动者之间的联合，提高他们的职业能力，或是将可造之材送入政策精英团队之中。他们往往领导一个强大高效的营运团队，把智库的一切都安排的有条不紊。据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张怡副院长介绍，复旦发展研究院有一支 20 余名国内外知名大学硕士组成的营运团队，正是团队的高效运作，才使得复旦发展研究院能够整合整个复旦的社会科学专家资源。南京大学的紫金传媒智库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包括秘书长闵学勤教授在内的 5 人专职+10 余位硕士生兼职的营运团队，这个营运团队一年中完成的活动已经有 30 余场，其中包括很多大型活动。

大学培育智库的第三个障碍是人才评价体系。为了满足学科建设取向的需要，尤其是面对当下“双一流”的建设热潮，大学对事关学科发展的指标非常重视，甚至不惜推倒对教授的长聘制度，全部教员纳入合同制管理，三年一个周期进行考核。对于许多还没有晋升到教授岗的教师而言，高层次的项目、一流期刊论文、高级别奖项和各种人才奖励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大部分智库性成果并不是晋升教授的依据。

总而言之，大学想培育出优秀甚至世界一流智库的道路是曲折迂回、遍布荆棘的。但是大学是不是就应该放弃培育智库？非也。大学发挥智库功能是大学服务社会、服务政治的需要，尤其是著名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很强，是国之重器，培育优

秀智库是大学的义务也是大学的责任。大学教授从象牙塔旋转到智库,经过智库的洗礼再回到研究机构,视角和体会都会不同,教学和研究都会变得更接地气。

三

1932年,罗家伦在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校长的就职演说中,以“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来定位学校的使命。时光荏苒,南京大学虽几经变革,但与时代、与民族同命运共呼吸的追求却始终未变;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瞄准世界一流、追求卓越的思维始终未变。

南京大学在中国智库史上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今天看来,这也是大学和媒体发挥智库功能的一个经典案例。10余年前南京大学提出了研究型大学“顶天立地”的发展战略:一方面确立重点学科发展战略,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科研成果;一方面融入国家地方创新体系,着力提升一流社会服务水平。在“顶天立地”战略的指引下,南京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通过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在不断提升研究层次和质量的同时,充分发挥哲学与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大多处于我国前列,实力雄厚,南大认为这种优势地位不仅不应该削弱,反而应该进一步加强。离开学科发展,高校智库建设往往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践也证明,南大在国内外有良好声誉的智库都以强大的母体学科为依托。

南京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拥有国家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1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2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4个,其他省部级研究机构25个,校级研究机构99个。南京大学根据教育部“并非所有的高校科研机构都要变成智库,也不是所有的高校重点研究基地都变成智库。而是重点研究基地可能有一批要转型升级发展为

专业化的智库,还有一批基地要发挥好智库功能,但并不要求向专业化的智库发展”的指示精神,提出重点建设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风险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紫金传媒智库等国家急需、学科雄厚、团队力量强的研究机构。南京大学建设的智库强调专业化:一是准确的功能定位,智库就是智库,不要过多承载其他非智库职能;二是明确的专业领域和方向,南大重点建设的智库都不是综合智库,都有明确的领域和方向,综合智库职能由南京大学整体承担;三是逐步形成的专业化的资政研究队伍;四是符合现代智库建设要求的治理结构、管理方式和运营模式。

陈骏院士指出在新型智库建设的时代课题中,“南京大学要以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己任,不断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大力推进原创科研,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南京大学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目标,开展校内外协同创新,结出了丰硕成果。

2015年4月,南京大学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正式组建了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CTTREC)。该中心以信息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创新团队为核心,积极开展智库研究和平台建设工作,并为江苏省有关部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一系列咨询服务工作。“中心”联合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的专家,集中力量攻关,开发的“中国智库索引”(CTTI)已经于2016年9月28日正式上线。2017年,我们又上马了“中国智库索引”(CTTI)二期工程,二期开发完成后,CTTI将变成集智库搜索、智库数据管理和在线智能评价功能为一体的集成信息管理系统。除了系统开发外,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还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是我国第一个设立智库研究与评价博士生导师培养方向的单位。中心已经培养出3名智库研究方向的博士,另有在校的5名博士生都以智库研究和评价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南大智库文丛”是南京大学整个智库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战略性的安排。它将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坚持高品位、高质量、前瞻性、实践性的遴选标准,不仅汇聚南京大学的智库类出版物,而且面向全国、面向国际接纳一流的智库成果,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打造一个新的智库出版名牌。

“南大智库文丛”已经出版智库类著作 6 种,从今年开始我们将出版年度中英文对照版 CTTI 智库报告。《CTTI 智库报告(2017)》内含 CTTI 来源智库发展报告、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和 CTTI 来源智库目录。“CTTI 来源智库目录”是我国第一份用英文向全球发布的全国性智库目录。这对世界了解中国智库,对中国智库走向世界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修订此序时,欣闻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CTTREC)被列为江苏省和南京大学社科建设的重点项目,备感责任重大,唯有勉力前行才能不辜负各方的期待,“南大智库文丛”见证了我们的努力。

李刚 修订

2018 年 3 月 27 日

前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新型智库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讲话建构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系统理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论述受到了知识界的热烈拥护,全国出现了建智库和用智库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决策咨询体系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

为了服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南京大学率先提出开发“中国智库索引”(CTTI)的设想,并得到了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的积极响应。自2015年起,双方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合作,在全国智库界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形成了包括CTTI在线索引系统、CTTI来源智库名录、CTTI年度智库报告、CTTI智库BPA三大奖和中国智库治理论坛在内“五位一体”的良好发展格局。

CTTI及CTTI Plus是南京大学和光明日报社联合开发和推广的智库垂直搜索、智库数据管理和智库在线测评系统。CTTI是一项基于中国体制优势、凸显中国话语的自主创新,在设计理念、功能布局、数据采集机制、评价机制等方面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系统采用MRPA测评体系与排序算法,同时支持可定制的主客观综合评价。CTTI实行数据全部由来源智库在线填报,经CTTI后台逐一审核的数据采集机制。秉持共建共享的原则,CTTI一期已经开放给近70家来源智库母体单位免费使用。2017年,CTTI二期项目启动,CTTI Plus版已经研发完毕,将于近期正式上线运行。CTTI Plus版是在CTTI基础上开发的全新版本。CTTI Plus版的新架构体现在创新的智库云管理功能和智库共同体机制两个方面。CTTI Plus版分为两类

用户,CTTI 共同体用户将以政府智库管理部门、高校智库管理部门和大型智库为主。CTTI 共同体用户在本地独立部署 CTTI Plus 系统,管理管辖下的所有智库,而且还能和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的主系统之间进行每日数据交换。目前,已有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和天津社科联两家单位成为 CTTI Plus 智库共同体成员,并将于近期完成系统部署。

“CTTI 来源智库目录”经过 2017 年的增补,已经达到 604 家,基本涵盖了我国最优秀的各类智库。2018 年 1 月,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发布了印本的《中国智库索引》,对 CTTI 来源智库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CTTI 来源智库目录”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全国性智库目录之一。

为进一步促进新型智库共同体的发展,给予各级各类优秀智库崭露头角的机会,发现优秀智库案例,双方于 2017 年开始设立 CTTI 智库 BPA 三大奖,即 CTTI 智库最佳活动奖、CTTI 智库最佳研究报告奖和 CTTI 智库最佳管理奖。希望 CTTI 智库 BPA 三大奖成为促进新型智库实践能力、选拔和表彰优秀智库的重要机制。

中国智库治理论坛由光明日报社、南京大学联合主办,以 CTTI 为纽带,将服务于全国智库特别是 CTTI 来源智库作为职责使命,其宗旨与追求是“务实、助推,心系新型智库共同体,铸就新型智库共同体,服务新型智库共同体,共同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贡献力量”。中国智库治理论坛是以 CTTI 为纽带,将服务 CTTI 来源智库作为职责使命。中国智库治理论坛的前身,可追溯至 2015 年 10 月在南京举行的“新型智库机构评估与治理创新专题研讨会”,那是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第一次联手,就智库治理与评价召开全国性会议。2016 年 12 月 18 日,“2016 中国智库治理论坛”在南京大学举办。年会设上午大会和下午 13 个平行分论坛,与会代表近 800 人。洪银兴、周洪宇、刘尚希、戴国强、王文、雷蒙德等名家发表主旨演讲。大会发布了 CTTI 在线运行版本,公布了首批 CTTI 来源智库名单。会议吸引了大量媒体报道,社会反响热烈积极。2017 年 12 月 20 日,“2017 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智库界、思

想理论界、省市自治区智库管理部门、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等领域近 800 人参加会议。其中,中国智库索引 CTTI 来源智库代表占据相当比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教育部社科司相关负责人到会指导,主办双方主要负责人张政总编辑、南京大学前校长陈骏院士发表致辞,分管领导李春林副总编、陆先高副总编、朱庆葆副书记等登台主持或发布研究成果。理论界和智库界名家魏礼群、张军扩、蔡昉、冯俊,年度智库代表刘鸿武等发表主旨演讲。在大会专设的两场专题会议、六个平行分论坛、多个成果发布环节中,更多与会者畅所欲言、深度交流。会议还发布了首次评选的八项“CTTI 年度精品研究成果”。除了光明日报及光明新媒体矩阵的全面报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治理》期刊等数十家媒体纷纷报道此次论坛,充分体现了该活动的影响力与辐射面。

CTTI 智库报告目前包含《2017 年 CTTI 来源智库发展报告》和《2017 年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等两个报告。2016 年中国智库治理论坛发布了《CTTI 来源智库 MRPA 测评报告》,该报告提出的 MRPA 智库测评指标体系与算法受到了智库研究界的广泛关注。该报告提出了“大学智库指数”的概念,并定义了“大学智库指数”的计算方法。在“2017 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上,我们两个中心发布了《2017 年 CTTI 来源智库发展报告》,该报告没有沿用“测评报告”的概念,原因是我们希望从发展的视角,对 CTTI 来源智库做更详细的扫描。《2017 年 CTTI 来源智库发展报告》首先回顾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简要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巨大成就,其次介绍了 CTTI 二期平台和来源智库增补情况。重点分析了社会智库和大学智库 MRPA 测评数据结果。另外,该报告还分研究主题评价了相关智库。在智库评价中,我们注意了两个问题:第一,对于数据不充分的智库类型,暂不进行 MRPA 测评。当前 CTTI 系统中,社会智库和高校智库数据比较完整,因此,率先开展的是对这两类智库的测评;第二,暂不公布智库测评的具体名次,而是按照汉语拼音音序公布排名前 30% 的智库,并逐一点评其上榜原因。这么做一方面保护了智库的隐私,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示了各级各